

从生活世界到自然资源：“人—自然”关系演变 视角下的森林退化

——基于云南 M 县田野调查

耿言虎

[摘要] 近代以来,“人—自然”关系呈现人类中心主义化的趋势。“人—自然”关系剧烈转型是生态危机的重要根源。以云南少数民族林区为例,阐释人—自然关系演变与生态危机的关联。借鉴日本环境社会学“生活环境主义”视角理解传统时期自然与生活者的关系。作为生活者的生活世界,森林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1)提供物质资料来源;(2)建构社会组织与规范;(3)魅化观念与信仰体系。现代社会的科学、国家、市场将自然祛魅化、资源化、资本化。1949年后,M县森林“异化”经历了两个阶段:国家主导的森林资源化阶段与市场主导的森林资本化阶段。人—自然关系不可逆转的演变某种程度上表明,生态危机是一种现代性的困境。

[关键词] 森林退化;生活世界;自然资源;祛魅化;自然异化

一、“人—自然”关系与生态危机

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已经作为一个“社会事实”呈现出来,草原沙化、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消失、气候变化等日趋加剧。学术界针对生态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反思^①。笔者认为,生态危机需要从长时段历史中“人—自然”关系演变的视角进行深度解读。解读人与自然关系首先需要解决对“自然”^②定位的认知,对此学界莫衷一是。美国学者邓拉普和卡顿认为外部环境/自然具有三种竞争性定位:生活空间、生存资源、废物储存和转化^[5]。荷兰学者范科本(Van Koppen)认为自然概念的理解可以分为三个理想类型:资源(Resource)、世外桃源(Arcadia)、生活世界(Lifeworld)^[6]。总体而言,近代以来,人对自然的认知发生了急剧转变,“人类中心主义”趋势不断加剧。

传统时期,由于科技力量和开发能力有限,人类不得不因势利导,遵循自然规律,被动适应自然。早期人类的宇宙观中,“人”被看做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认为传统时期的自然是“有机体自然”(Organic Nature),自然世界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类、

[收稿日期] 2013-10-08

[基金项目]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村民环境行为转型与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基于若干流域村落的调查”(CXZZ12_0220);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生态遗产研究”(201206710004)。

[作者简介] 耿言虎, 河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邮编: 210098。

① 主要反思研究包括:制度学派如哈丁“公地悲剧”理论,参见文献[1];宗教、文化学派如林恩·怀特“犹太—基督教”文化与生态危机,参见文献[2];政治经济学派如施耐博格“生产跑步机理论”,参见文献[3];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如贝拉米·福斯特“代谢断裂”理论,参见文献[4]。

② 由于人口的膨胀与人类活动能力增强,原生态的自然越来越少。本文中的“自然”特指“人化自然”,即被人改造和加工的自然。

自然、超自然三个领域具有连续性。而现代社会中的自然则演变成“资本化自然”(Capitalist Nature),人成为自然的控制主体^[7]。知识、权力和资本将自然客体化、商品化、资源化,人与自然关系出现根本性的分裂与二元对立。卡顿和邓拉普指出现代社会支配人类发展的是“人类例外范式”(Human Exceptionalism Paradigm)。这一范式认为:人类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物种,文化可以无限转换,人类的进步可以不受外在条件(包括资源、环境)的约束。而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范式和无限进步的乐观主义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因此,他们积极倡导环境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转移,以“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取代“人类例外范式”^[8]。

笔者将研究聚焦于森林生态演变这一具体场景中,以此解读人—自然关系演变的生态后果。现代社会森林砍伐、森林商品化和树种单一化趋势不断加剧,森林退化造成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短缺、局部气候变化等多种后果。笔者选取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生态发生急剧变迁的M县作为田野调查点。M县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历史上原始森林茂密,有“林海”之称。M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主体民族包括傣族、佤族、拉祜族等。M县的地形山坝相间,群山之间有一些肥沃的平坝,山区面积高达98%。历史上,傣族居住在平坝地区,以水田稻作为主要生计方式。佤族、拉祜族居于山区,以刀耕火种为主要生计方式。传统时期,当地有多样化的森林认知与利用方式。1949年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渗以及市场化下的资本力量渗透,森林退化明显,呈现两个阶段的特点:其一,森林的消失及其生态问题。表现为森林覆盖率的不断降低,森林减少,这一趋势持续到1980年代初期。森林覆盖率从新中国成立初的65%下降到1981年的34%^[9]。森林减少导致了水源缺乏、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其二,森林的“恢复”及其问题。1980年代以来,随着森林保护政策、植树造林以及市场化推进,人工林面积迅速增加。2000年左右,森林覆盖率恢复到60%以上。虽然森林覆盖率迅速提高,但是更深层次的生态问题日益凸显:原生林被单一化的人工林替代,物种多样性锐减、化学肥料与农药大量使用、水资源短缺等。笔者的田野调查时间为2010年3—4月,2012年7—9月,共计80余天。利用社会学、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文献法收集大量一手资料,本文将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在具体的研究切入点上,笔者尝试从当地居民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视角解读人—自然关系及其演变。原因如下:其一,当地人(Local people)与自然紧密的关系。人在与自然相处中总是不断地对其进行改造、加工。当地人与周围的自然和环境具有紧密且多样化的联系;其二,人与自然互动是在日常生活中呈现的。人要生存,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必然与自然发生联系。人总是在利用自然中对自然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二、传统时期的森林:一个生活世界

(一) 自然作为生活世界

以当地生活者的视角“从内向外”看,传统时期的自然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活世界,自然与生活是紧密契合的,这就需要刨除“从外向内”看把自然视为“世外桃源”的浪漫主义的认知以及无限夸大生活者环保意识的“绿色尚古主义”思想^①。提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球体印象”(image of globe)观点指出,从生活者之外看自然/环境,就如同远距离观看球体,本身已经意含了“主体—客体”、“人—自然”的分割与对立^[10]。英戈尔德反对自然决定文化,文化型塑自然的二元论,他认为

^① 按照米尔顿的观点,“绿色尚古主义”(Green Primitivism)被推崇可能是由于现代人仅仅关注我们现代社会关心的问题,比如说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而怀念过去的人与自然相对和谐的时光。但是,传统人的生态平衡是他们活动的一种可能的结果,而并不是他们有意追求的一种目标,参见[15]。

需要站在生活者的立场“感知环境”,理解人与自然相处中二者关系是在生活实践中建构的,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栖居理论”^[11]。与此相类似,日本环境社会学的“生活环境主义”理论是从日常生活视角解读“人—自然”关系的代表性理论。通过对日本琵琶湖治理的深入调查,以鸟越皓之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提出“生活环境主义”的理论观点^[12]。其主要论点可以概括如下:(1)在“人—自然”的关系上,二者有共生性。人和自然在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中,互利共生,不可分割。生活环境主义“既要能从生活的角度安抚自然,又能使其成果得到反馈”,要在“使用中保护环境”。生活环境主义抛弃了两种环境人的假定:一种认为人天然就是环境保护者,另一种认为人总是环境破坏者。(2)在研究的角度上,强调生活者主体性,关注其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反对把自然孤立化为纯粹物质的认知,运用联系的观点把自然嵌入生活者日常生活中加以理解。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反对单纯以“自然主义范式”和“现代科学范式”为主导的环境认知与治理。生活者环境行为的出发点不是依据现代科学知识,而是他们的生活本身。(3)强调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默会知识”。与现代科学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意义、可推广性的知识不同,很多默会知识或者地方知识是实践的产物,不系统,难以被科学证明,甚至是其中的生活者也很难准确说出奥秘所在,他们的行为常常是一种惯性的实践。但是这种实践本身却对环境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

(二) 生活者与森林

盖尔·怀特曼(Gail Whiteman)和威廉姆·库帕(William Cooper)在对加拿大魁北克克里(Cree)印第安人部落的民族志研究基础上提出“生态嵌入”^[13]这一理解当地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概念。“生态嵌入”可以理解的传统时期人与自然相处的典型状态。调查点M县,传统时期当地人的日常活动、社会规范、观念与文化是嵌入在森林中的。森林是当地族群生活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三层互动关系:其一,物质形态的森林为人类生存提供必不可少的生活与生产资料;其二,长期与森林互动,当地关于森林的整套社会规范与地方生态知识得以建构;第三,森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被魅化的客观存在和人的精神信仰。

1. 森林与日常生计活动

森林以其物质形态满足了山民多样化的需求。山民在与森林的长期互动中也形成了多样的森林利用方式,主要体现在:(1)农—林混合农业。在农—林混合农业中,林地被临时性地转变为农业用地,种植1~2年后又恢复为森林用地。燃烧后的树木灰烬被作为农作物的肥料。这种农业又称为游耕、刀耕火种等,是人和森林紧密结合的农业类型。低密度人口、分区域、有秩序地循环游耕保证了森林的恢复。(2)狩猎。传统时期,M县森林中动物种类繁多,如老虎、麋子、马鹿、黑熊、野猫等,还有各种鸟类。当地的山地民族,如佤族、拉祜族历史上都擅长狩猎。拉祜语中的“拉”是老虎,“祜”是“烤肉”,拉祜就是“烤虎肉”,体现了历史上拉祜族的狩猎传统。狩猎也是平坝地区傣族日常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种植业的重要补充,狩猎是当地人获取肉食的重要来源。同时,狩猎也是重要的娱乐活动。(3)采集。森林是无尽的宝藏。采集一直是森林人的重要生计。随着农业发展,当地山民对采集依赖性逐渐降低,但重要性仍不可低估。当地传统采集品种包括:作为食物的野菜类,如野芹菜、水香菜、鱼腥草、马蹄根、苦凉菜等;野果类,如锥栗、蔓登、多伊、橄榄、杨梅、火把果等;药材类,如锥栗、蔓登、多伊、橄榄、火把果等;其他用途的植物,如编筐的藤、竹子。(4)水源。森林与水源的关系极为紧密。在M县多山地形中,森林是水的重要存储库。在植被丰富的地区,“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当地人的生活用水一般取自山林水形成的泉眼和箐沟。傣族的水稻种植对水更加依赖,历史上水源附近的森林都受到特别的保护。(5)木材。木材有两个主要用途:柴火和建房。木材是当地的主要燃料来源,传统房屋也以木质为主。一般村寨对用材林都做了区域限定。(6)放牧。当地主要家畜是牛(黄牛、水牛)、猪等,森林中各种藤类、草类植物是家

畜获取食物的场所。历史上,山民有“放野牛”的习惯。(7)景观、防风等。部分道路两旁、村寨附近森林常常作为景观、防风之用。

2. 社会规范与地方知识

生活者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与社会组织方式。依托于与自然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和结构保证了地方社会生产生活的满足,同时也注意对自然的保护,避免其被过度消耗。伯尔德将外部环境分为两种类型^[14]¹⁵⁸:供给环境(The giving environment)和互惠环境(reciprocating environment),前者是无条件提供给人类的,后者的供给是以人类履行职责为条件,需要生活者的悉心保护。大部分的自然都是互惠环境。传统时期,围绕森林的保护和利用,当地形成一套地方社会规范和知识体系。森林对当地社会规范和制度的形成也起到了特定作用。(1)森林管理制度。当地传统的森林使用有严格的社会规范。资源管理是以地方社区为基础的。在村寨中,森林被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和用途,庵林、坟山、用材林、水源林等。每个村寨都有地方村规民约对森林使用加以限制。例如笔者调查的帕村,解放前偷伐一棵树要罚款1元。勐村砍树要向村寨首领“布改”汇报,未经允许超伐1棵要补种10棵幼苗。在M县土司的官员设置中,有专门负责管理森林的官员:法可相。村寨中的“头人”一般是森林管理制度的监督者和执行者。地方社区依托传统的非正式社会规范、习俗等为基础的森林管理制度是有效的。哈丁所谓“没有管理的公有地”^[15](The unmanaged commons)在传统的较稳定的地方社区并不存在。(2)地方生态知识。山地民族对森林并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而是有节制地使用,在使用中保护。在满足生存需求和保护森林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当地人与森林的互动实践中形成了大量的保护森林的地方知识,即所谓的地方生态知识。笔者以刀耕火种农业作为典型例子,阐述生态知识的嵌入。刀耕火种农业在新中国成立后曾被认为是严重破坏生态的农业方式而被政府禁止、改造。近年来人类学、生态学者的研究成果使这种观点逐渐被修正^①。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可以兼顾生产与生态的平衡。典型的刀耕火种农业,轮歇地经过严格的规划,耕地与撂荒地比例一般都在1:5以上。同时,有一套严格的社会规范和禁忌保证森林生态的平衡。例如,烧轮歇地的一般原则有“五不放火”:不经批准不放、风大不放、无人看管不放、无“防火线”^②不放、非轮歇地不放。弃荒的轮歇地,需要把树“养”大。在此期间,不能破坏其植被恢复,例如严禁在弃荒地上放牧。砍树一般都留30~40厘米的树桩,保证树可以“发”,同时也可以减少水土流失。这些基于森林使用形成的社会规范和地方知识有效地保护了森林。

3. 观念体系与信仰禁忌

对于山民来说,茫茫的森林是充满神秘的圣地。当地民族众多的神话传说都是以森林为原型展开的,森林是人们心中的圣地和信仰的终极归宿。在傣族的历史文献中,大量的神话传说都以森林为主题。佤族传统宗教是以自然崇拜、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三位一体的原始宗教,山、水、林无不有神。拉祜族也是万物有灵论信仰,神话史诗《牡帕密帕》反映了拉祜族的信仰体系。在拉祜族的信仰体系中,茫莎是万物之神,掌管风、雨、电、树等小神。森林的“魅化”更深刻体现在生活者的日常实践中。仪式实践是体现人—自然关系的重要维度。在仪式与生态研究的经典著作《祭祖之猪》中,罗伊·拉帕波特指出新几内亚僧巴加马陵人家猪屠宰的“凯科仪式”具有维护生态,调整人

① 人类学对云南“刀耕火种”的研究代表人物是尹绍亭。他否定“刀耕火种”是原始农业的提法,而将其看做人适应环境的产物,刀耕火种多样化的形式、丰富的农耕礼仪体现人对差异化环境的适应,参见[16];生态学研究则发现刀耕火种农业不仅没有造成森林破坏,与固定农业相比,更能保护物种多样性,参见[17]。

② “防火线”是在已规划的、待烧的林地四周清理出一圈3~4米宽的界限,这条界限内需要将可燃物完全清理干净。据当地老人说,连一个树叶、一棵草都不能有。防火线保证了大火不会肆意蔓延到其他森林。

与土地比例,将过剩的猪以猪肉的形式在地区人群中分配等功能^{[18]224}。傣族文化中的“竜林”禁忌是文化与生态紧密结合的代表。据考证,傣族由历史上的采集狩猎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其文化内核中依然保留了“森林崇拜”的痕迹。“竜林”作为傣族的一种神山、神树信仰,竜林禁忌客观上对森林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信仰佛教的傣族人认为,菩提树是“神树”,大青树是“鬼树”。老人表示,以前别说是砍树,就是进竜林都怕,一般一个人都不敢去。当地人对触犯竜林会遭受“报应”笃信不疑。在禁忌文化的影响下,竜林成为傣族村寨的一项文化与自然遗产而世代传承。而在傣族的泼水节、开门节等重要节日,傣族习惯上去竜林祭拜,以求神之眷顾。郁郁葱葱的竜林为傣族人提供了源源不竭的水源。竜林是自然、文化、社会紧密结合的独特现象。解放以前M县森林的高覆盖率于竜林禁忌密不可分。

三、现代的森林:客体化、资本化与资源化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随着人类力量的急剧膨胀,征服自然的欲望渐增,自然逐渐褪去神秘的外衣,成为人类支配的对象。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是以“时空压缩”和“脱域”为主要特征的。脱域意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而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构成了“脱域”的前提^[19]。某种程度上,自然也经历了一次“脱域”的异化过程。现代科学、国家、市场力量将自然祛魅化、资源化和资本化,自然从地方性背景和当地人的生活世界中脱离,成为客体化的资源。

(一) 自然异化的一般机制

1. 现代科学与自然祛魅化

自然被视作客体化的资源思想起始于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态度。这种态度源于工业革命后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以17世纪西欧新兴的科学哲学为代表,这种科学哲学强调元素主义和客观主义,这突出体现在被认为是现代科学之父的弗朗西斯·培根的“自然”思想。培根的实验方法对男性与女性、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理性和情绪进行了根本的二元区分。在《男性时代的诞生》(The Masculine Birth of Time)一书中,培根认为会有英雄和超人般的群体统治自然和社会,男性要征服女性,现代科学要变成“雄性科学”,需要积极主动征服自然。在培根的认知中,未来社会是一个以科学为主导的社会,自然从一个有生命力的、滋养的母亲变成无生命的、僵死的、可操纵的物质^{[20]231-235}。培根的认知与资本主义剥削自然的内在属性是契合的。可以说,科学的进步与自然的祛魅是同步的。贝拉米·福斯特以“韦伯与环境”为题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文,指出“祛魅化”是韦伯对环境社会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在无法逃避的祛魅化的历史进程中,“上帝退出了,神圣消失了”,韦伯似乎带有一种忧郁和怀旧的情愫在观察周遭的变化。韦伯的祛魅化思想不仅是指人类关于启蒙的辩证法,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生态含义,代表了人类在征服自然上的内在矛盾性^[21]。

2. 现代国家与自然资源化

在前现代化时期,国家权力也在试图控制自然。但是,由于技术手段尚无法达到,控制力度非常有限。随着实用主义逻辑的强化和控制力度的加大,自然越来越被纳入国家管理的视野中。“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的核心就是一种简单化和清晰化的实用主义逻辑^[22]。在詹姆斯·斯科特看来,国家将森林简化成“木材”,将草原简化为“草量”,而忽视了自然多样化的功能以及多元的地方文化与社会价值。在国家“简单化”的认知中,有价值的植物是庄稼,没价值的是杂草;有价值的树出产木材,不能出产木材的就是“杂”树或“矮树丛”;有价值的动物是猎物或家畜,没价值的是“害兽”。在国家的财政森林中,树的多种多样的用途被单一化的木材和燃料的容量所

取代。奉行实用主义逻辑的国家将森林变成生产商品的机器。普鲁士的“科学林业”可以说明国家逻辑与自然资源化之关联。“科学林业”本质上是一种林业的标准化生产体系。在这种林业规划中,矮树丛被清除,树种被消减,同一树龄、树种的树苗被整齐划一地排列种植。清晰化的林木种植,方便了林业工人的标准化的培训与管理,化肥施用量、除草以及降雨等变量很容易观察并且通过实验操控,持续的森林产出得到保证。“科学林业”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森林建设的主要指导思想。

3. 市场与自然资本化

实际上,在很多自然的理性化改造案例中,市场同样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现代社会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市场社会”。费尔南多·科罗尼尔(Fernando Coronil)在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的思想启发下提出“市场的嗅觉”(Smelling like a market)这一观点与斯科特遥相呼应。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与市场紧密关联。科罗尼尔指出市场如水流般无孔不入的特征,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重组了社会和自然^[23]。在市场与生态关联的论述中,卡尔·波兰尼的思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波兰尼以市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为切入点,并将其关系演变放在长时段中考察,指出市场从传统时期的“嵌入”到现代时期的“脱嵌”的“大转型”历程。完全自发调节或曰脱嵌的市场成为改造自然的重要力量,市场不断地把土地、河流、森林等变成“虚拟商品”,纳入交换领域。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市场作为一个资源配置手段,在改造自然方面亦表现得愈加明显。市场运作有其内在机制,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经济人,追逐利润最大化。正如波兰尼所说,“19世纪文明就有独特而鲜明的意义,它选择了图利作为文明的基础。而图利在人类历史上从未被认为是有效的行动,这种动机从未被提高到作为人类日常行为和行动标准的高度”^[24]。在资本增值逻辑下,“自然”吸引了资本投资,资本借助自然得以增值。

总之,知识、权力和资本在将自然转化为资源的过程中实现了有效的“合谋”。自然不可逆转地实现了资源化。

(二) 森林资源化的过程

M县森林如何从当地村民生活世界中剥离,并逐步被异化为自然资源,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权力、知识与资本多种力量交织其间。

1. 国家主导下的森林资源化:1949—1990年代初

权力与资源化关系密切。按照斯科特的理解,国家的视角下的森林被看做木材资源、林地被看做土地资源。M县的森林变迁中,国家权力与自然的关系是什么呢?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1949年前,M县由傣族土司政权统治,宣抚司对山地民族采取委任地方首领的统治方式,除了纳粮和徭役外,村寨基本自治。1949年后,土司统治结束,新政权建立,国家权力开始下渗至乡村。随后,在一片改天换地、除旧布新的“人定胜天”^①意识指导下,自然被视为可以被征服和驾驭的“敌人”。国家主导的一系列开发政策严重破坏生态。当国家资源开发同地方信仰体系、地方知识碰撞时,产生的结果表现为两种形态:(1)信仰祛魅。当地传统的信仰禁忌限制了对森林的过度开发和使用,构成了对国家开发政策的阻碍。政府认为传统信仰是“迷信”,积极宣传破除迷信。M县档案馆的文献材料记载了多次因政府砍伐麓林大树作木材与当地傣族引起的冲突。例如其中一段“公信区政府盖房子砍了他们麓山几棵树,群众意见很大,一定要区政府买香纸烛去送鬼敬神,否则他们

①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句家喻户晓的口号反映了毛时代视自然为敌人,藐视自然、征服自然的态度,这种意识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夏竹丽(Judith Shapiro)通过对大跃进、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寨、围湖造田等政治运动的环境后果的详细分析,阐释了政治—意识—环境的复杂互动关系,参见文献[25]。

就不住此村了。结果,区政府买了香纸烛去敬神,群众也就息怒了。”^[26]初期,由于传统地方力量非常强大,地方政府表现出一定的妥协。随着政府权力的日渐扩张,地方头人式微,地方话语的力量越来越微弱^①。“向神山开炮,向鬼神进军”表明国家开发森林的决心。1949年后进入的地方政府、驻军部队、汉族教师等外来移民群体等彻底破坏了当地的民间信仰体系。在“国家—社会”力量对比中,地方社会力量越来越无力抵抗强势的国家权力。随着“除四旧”特别是“文革”后,当地传统信仰彻底被定义为迷信,甚至连佛教信仰也被取缔。生长着百年以上树龄的大片森林遭到砍伐。(2)知识替代。知识体现人对自然的认知,指导人对自然的利用方式。与传统地方生态知识相比,政府的极端实用主义的新知识是一种破坏性的知识体系。政府对刀耕火种农业的理解过于“简单化”,认为“刀耕火种”产出低、资源利用率低、破坏环境,特别是认为撂荒地闲置是对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撂荒地森林植被恢复重要生态价值被忽视。政府依据汉区农耕经验,以提高产量为目标,对民族地区的传统农业进行改造。农业改造以毛泽东的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指导。在农业“以粮为纲”政策指引下,“固定耕地”逐步替代“轮歇地”,大片森林被砍伐用于耕种,耕地面积迅速扩张。但是,汉区农业以“土地”为核心,刀耕火种农业以“森林”为核心,这是两种本质上不同的农业类型^{[16]248-249}。简单的农业替代必然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

2. 市场机制下的森林资本化:1990年代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意味着市场开始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谋利属性的资本看中了森林的资源价值,纷纷投资森林,以实现资本的增值目标。由于森林投资的巨大收益,“炒林”一度成为投资热点。同时,M县政府也寄希望于做大做强森林产业,正在实施的“中低产林改造”项目,计划将每亩年木材蓄积量低于5方的林木按照现代林业标准改造,预计改造22万亩,以提高森林资源质量。为了吸引资本进入,M县推出了一系列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在优惠的政策、可观的收益率刺激下,资本下乡加速。村民表示“现在有点钱都想做老板,来包林种树”。在M县,投资林业的老板包括国内外企业、县内机关单位以及个体老板等。主要投资方式包括:(1)承包林地。承包的林地所有权,既有国有林地,也有集体林地和个人所有的林地。2010—2012年,一亩林地一年的转包费用约300元左右;(2)与当地村民合作种植。农民提供土地,商人提供树种,种植速生林木。树木成熟后砍伐出售,按一定的比例分成。由于有一定的经济效益,村民有动力流转林地。森林流转后,由于原生林经济价值低,一般采取“皆伐”的方式,全部砍光原生林木。有经济价值的林木卖掉,没有经济价值的烧掉。最后种植新的树种。在树种选择上,为了追求经济效益,普遍种植生长周期较短的速生丰产林,如桉树、西南桦等,树种单一化明显。

与外来投资种树并行的是当地农民的经济理性的膨胀。在“向钱看齐”的价值观指引下,农民的生计方式也发生极大变化,纷纷转向市场导向型农业。橡胶、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面积迅速扩大。以橡胶种植为例,笔者调查的“橡胶村”双村,村寨的水源林、柴山等都被橡胶林所取代。对于村民来说,橡胶树是“摇钱树”。橡胶林可以割胶,卖胶水,但已经与村民没有任何其他关联了。森林从传统时期的多样化利用转化为单一经济功能,森林与人关系逐渐疏离。一位老村民用惋惜的口吻说道,现在的森林“鬼神走了,鸟也走了”。传统时期多样的动植物资源消失了,水源干涸了。村民成为专业胶农,依靠橡胶收入,从市场购买生活所需。由于当地修水库,村中安装了自来水,水

① 1950年代,随着新的政权的建立和国家权力强化,政府有意识地弱化地方头人的作用。基层政权整顿和加强的措施包括:(1)把村的范围缩小,削弱头人的势力范围。新划建的小村就由积极分子当干部;(2)将影响较大的头人逐渐调县、区安置工作,减弱其影响;(3)县政府、工委积极培养劳动人民出身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或担任基层政权干部,稳妥地把头人掌握的基层权力转移到劳动人民手中。

库水取代泉水成为当地的饮用水源,村民们不再关心水的来源。传统时期,森林是天然的牧场,是放野牛的场所。而种橡胶后,橡胶林则需要防“牛害”,放牧也消失了。

四、结论

森林从传统时期的生活世界变成自然资源,森林定位的转化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急剧转变。森林不再是居民栖居的场所,不再是充满幻想的圣地。随着权力、资本、知识等的多种力量的作用,人开始精心规划设计森林,目标是使森林产生更多效益。我们可以看到森林对于村民的多重身份转变:(1)从功能上说,森林的多功能转化为单一功能。历史上多样的用途消失了,采集、狩猎、放牧、薪炭等功能逐渐消失,变成单一经济功能;(2)从意义上说,森林的物质、社会、文化意义变为单一物质资源。历史上森林具有的多元的物质、社会、文化意义逐渐消失,森林被异化,仅仅成为单一的物质化资源;(3)从价值上说,对森林的关注从使用价值转移到交换价值。生态环境本质上是人的栖息地,但是当作为资源看待后则被过多赋予经济价值。历史上村民关注的是森林的使用价值,但现在更关心在市场交易中的交换价值。森林从生活世界到自然资源的角色转变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表现为森林物种单一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水资源短缺等。据绿色和平组织2013年的调查显示,云南天然林中保存较为完好的原生林面积只占云南森林面积的9%^[27]。森林退化某种程度上表明生态危机是一种“现代性困境”,需要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反思人与自然关系转变原因及其后果。

[参考文献]

- [1]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968, 162(3859): 1243 - 1248
- [2] White L.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Science*, 1967, 155(3767): 1203 - 1207
- [3] Schnaiberg A. *The Environment: From Surplus to Scarc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 Foster JB. 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 105(2): 366 - 405
- [5] 洪大用. 西方环境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 1999(2): 85 - 98
- [6] Koppen V. Resource, Arcadia, Lifeworld. Nature concepts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Sociologia Ruralis*, 2000, 40(3): 300 - 318
- [7] Escobar A. After Nature: Steps to an Anti-essentialist Political Ec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9, 40(1)
- [8] Catton W R, Dunlap R E.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 New Paradigm.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1978(13): 41 - 49
- [9] M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M县县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114
- [10] Ingold T. Globes and Spheres: The Topology of Environmentalism//Michael R. Dove, Carol Carpenter. *Environmental Anthropology: A Historical Reader*.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8
- [11] Ingold T.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12] 鸟越皓之. 环境社会学——站在生活者角度思考. 宋金文, 译.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9
- [13] Whiteman G, Cooper W H. Ecological embeddednes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6): 1265 - 1282
- [14]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Unmanaged Commons: Population and the Disguises of Providence//Andelson, R. V. (ed.). *Commons Without Tragedy*, Savage (MD), Barnes and Noble, 1991
- [15] 米尔顿. 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 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 袁同凯, 周建新, 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 [16] 尹绍亭. 人与森林: 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 [17] Xu J C, et al. Effects of Swidden Cultivation, State Policies, and Customary Institutions On Land Cover in a Hani Village, Yunnan, China.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9, 19(2): 123 - 132
- [18] Rappaport R. *Pigs for the ancesto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19]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田禾,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20] Sachs W.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A Guide to Knowledge as Power*. London: Zed Books, 1992
- [21] Foster J B, Holleman H. Weber and the Environment: Classical Foundations for a Postexemptionalist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2, 117(6): 1625 - 1673
- [22] 詹姆斯·斯科特.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王晓毅,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 [23] Coronil F. Smelling like a market.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001, 111(1): 119 - 29
- [24]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刚, 等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25] Shapiro J. 2001.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 [26] 云南省林权工作组. 关于 M 县林权的调查情况及会议处理意见的报告. M 县档案馆, 1962
- [27] 绿色和平. 危机中的云南天然林—云南天然林现状研究调查报告.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ublications/reports/forests/2013/yn-natural-forests-study/>

From Life World to Nature Resource: Forest Degeneration on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 on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in M County Yunnan Province

Geng Yanhu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ppeared an anthropocentrism trend in the modern time. The change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is the significant root of ecological crisis. Taking forest region in minority area of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change and ecological crisis. Using the idea of “Life environmentalism” pointed out by Japanese environmental sociologist interpre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ure and citizen in traditional time. As the life world for the local citizen, the role of the forest can be as follows: a) Provide the source of material goods; b) Construct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norms; c) Deify forest and belief system. However, science, state and market of modern society entzauberung the nature as resource, capital. After 1949, the alienation of the forest in M county experienced two stages, that they were resourcezation of forest led by government and capitalization of forest led by market. The irreversible change of Human-Nature relationship demonstrates, to some degree, that ecological crisis is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Key words Forest Degeneration; Life world; Nature resource; Entzauberung; Nature alienation

(责任编辑: 常 英)